



河南出版基金
HENAN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河南黄河史

河南黄河河务局 编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 郑 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黄河史 / 河南黄河河务局编著 .-- 郑州 : 黄河水利出版社 , 2024.12 .-- ISBN 978-7-5509-4050-5
I.TV882.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KG0921 号

策划编辑: 陶金志 电话: 0371-66025273 E-mail: 838739632@qq.com

责任编辑 景泽龙 责任校对 高军彦

封面设计 张心怡 责任监制 常红昕

出版发行 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 49 号 邮政编码: 450003

网址: www.yrcp.com E-mail: hhslcbs@126.com

发行部电话: 0371-66020550

承印单位 河南博之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39.25

字 数 5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24 年 12 月第 1 版 202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0 元

《河南黄河史》编委会

主 编	张群波			
副 主 编	姚自京	甘保恩	杨旭临	朱清韶
	艾广章	李 杲	李永强	仵海英
委 员	李东阳	庄 建	方祖辉	高冠鹏
	李明生	王中峰	郭 鹏	李 磊
	荆朝晖	赵 炜	刘明震	
学 术 顾 问	王渭泾	侯全亮	陈维达	张新斌
	杨秦予	王星光	陈隆文	牛建强
执 行 主 编	赵 炜			
执行副主编	李 铤			
编 写 人 员	谷长风	杨保红	司晓云	晏 洋
	孙 冬	王 舒	吴祖波	黄 政
	王天昊	柳 平	王晓凤	费 凡
	焦趁趁	杨 晓	任雅新	侯晓蕊
	刘君瑜	陈燕奇	张奇慧	耿文静

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 浩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国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位居中原，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先后有 20 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史记·封禅书》里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这里逐步形成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伴河而生、因河而兴，郑州、安阳、洛阳、开封等古都的繁荣兴盛，都得益于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黄河漕运之发达、农业生产条件之优越，不仅奠定了河洛文化、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黄河河南段由山区向平原过渡，地理位置特殊、河道形态复杂，是全流域治理的重中之重。该河段河道淤积严重，“地上悬河”突出，为典型的游荡型河段；洪水突发性强，预见期短，防守无周旋余地，历史上决溢、改道频繁。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 602 年（周定王五年）到 1938 年的 2540 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 1500 多次，其中有 2/3 发生在河南境内，大的改道 26 次，河南占了 20 次，给两岸人民带来了

2 河南黄河史

深重的灾难。因此，黄河的治与乱与国家、河南的兴与衰密切相关。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开始，到汉武帝瓠子堵口、王景治河，以及鸿沟水系的开挖和汴渠的发展等，历朝历代都为黄河的治理开发进行了不懈探索。“黄河宁，天下平”成为沿黄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在烽火硝烟中起步，如今基本建成“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创造了70多年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引黄供水从人民胜利渠首开开闸取水先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00多亿立方米黄河水润泽中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一座座依河而兴、因水而美的城市明珠遍布黄河两岸。黄河从“中华之忧患”变为一条“安澜之河”“利民之河”“幸福之河”，成为中国粮仓丰廩的重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流域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依托，古老的黄河显得更加年轻、更加多姿多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保护治理工作，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黄河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一幅壮美的新时代“幸福河”建设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不忘历史，开创未来。对黄河治理开发史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其中宝贵经验，对于开创治河事业新局面，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河南黄河河务局组织编写的这部《河南黄河史》，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河南治河事业的兴衰起伏、重

大成就、经验教训，从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

通过本书，还能深入了解、认识黄河在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以及黄河对河南历史发展进步的重大影响和密切关系，帮助人们温故而知新，追溯过去，继往开来。该书的出版，将为河南黄河保护治理事业的继承发展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而且对其他流域的治理也会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是为序。

2024年2月

前言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学术界对黄河水利史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这样的形势下，系统审视黄河河南段在国家、河南和流域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具有通史意义的治河研究，全面记录河南黄河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示历代黄河治理的艰辛历程网重大成就，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22年9月，河南黄河河务局启动《河南黄河史》的研究与编写，成立了编委会，组织了写作班子，各项工作随之迅即开展。2023年2月，《河南黄河史》大纲专家咨询会在郑州召开。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本书学术顾问应邀参加，就全书的定位、学术价值及章目设置等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在研究、编写过程中，主要把握了以下原则：坚持以客观论述为主，充分反映河南黄河保护治理的历史成就；坚持以史实为依据，对历史资料进行精心选编、认真鉴别、反复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做到言之有据、史实准确、避免谬误；对没有经过历史沉淀的人物和事件，暂时搁置不表，避免引起争议；坚持突出特色，从国家层面看河南

2 河南黄河史

黄河，从流域角度写河南黄河，站在历史的高度论述黄河与河南的密切关系，深入探讨河南黄河在国家、流域和河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作用，力求为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

本书编写期间，编委会组织编写组全体人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实地调研黄河流路变迁、考察治河历史遗存、交流解决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推进《河南黄河史》研究编写。为深入挖掘有关史料，有关创作人员先后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潘季驯纪念馆等地进行座谈调研、收集资料。编写组全体人员以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废寝忘食，认真研阅原始资料，注重吸收既有研究成果，做了大量艰苦而又富有成效的工作。经过数易其稿，初稿编竣。之后，各位学术顾问饱含对母亲河的拳拳深情，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

2023年10月，编委会和黄河水利出版社联合在小浪底召开《河南黄河史》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河南黄河史》编撰的总体思路、主体定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的出版意义重大，为黄河分区域研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是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一大成果，具有较高的时代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各位专家还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结合河南黄河实际，从历史观、文献考证和内容取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操作性极强的意见和建议。据此，主创人员对书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于2024年5月正式提交出版社。本书的编写，跨越三个年头，可谓

“三载辛苦不寻常”。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黄河史》的研究编写还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王浩先生拨冗作序，热情推介。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士也从各种角度提供资料、补充图片，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在此，对他们的支持与贡献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都是首次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不足，加之初稿又出自多人之手，在体例文风、内容取舍、资料考证等方面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诚挚希望水利界、史学界以及关心支持河南黄河保护治理事业的领导、专家、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河南黄河史》编委会

2024年12月

目 录

序

前 言

1 绪 论

11 第一章 先秦时期黄河对中原的馈赠

- 13 禹河故道
- 20 河图洛书与河洛
- 28 治水传说
- 33 从双槐树到二里头
- 44 会盟之地
- 50 漳水十二渠和鸿沟水系
- 55 以水代兵
- 61 堤防初创
- 66 独树一帜的中原文化

75 第二章 汉代黄河水利建设的兴起

- 77 汉志河及沿河的繁荣
- 84 河患和河道变化
- 91 瓠子堵口
- 95 几种治河思想的出现

2 河南黄河史

- 101 贾让三策
- 108 王景治河
- 116 治河技术的进步
- 121 洛阳漕运中枢的确立

127 第三章 曲折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 129 黄河水患及其防治
- 133 相对稳定的河道
- 138 战争下的黄河航运
- 148 中原水系的发展与淝水之战
- 153 北魏迁都洛阳
- 159 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 164 酈道元与《水经注》

173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黄河水利事业

- 175 隋唐黄河大水及严重的五代河患
- 182 滑州的河患与治理
- 187 隋代运河的开挖
- 197 唐代黄河漕运的发展
- 203 唐代河南地区农田水利的兴衰
- 207 治河技术的发展
- 212 黄河水利法规的制定
- 216 神都洛阳

225 第五章 北宋时期的河患及治河论争

- 227 河患及河道变迁

- 233 繁重的治河工役
- 240 激烈的治河论争
- 249 都水监
- 256 河工技术的发展
- 265 大伾山和济水
- 272 《农田利害条约》与引黄放淤
- 276 汴河漕运繁荣发展
- 283 鼎盛时期的东京汴梁

291 第六章 金元两代的河防工作

- 293 严重的河患与混乱的河道
- 300 贾鲁堵口
- 305 河防与治河技术的发展
- 311 《河防令》的颁布实施
- 315 最早的治河著作《河防通议》
- 321 都实考察河源的成就
- 330 郭守敬与黄河水利开发

335 第七章 明代治河事业的发展

- 337 紊乱的河南黄河河道
- 342 灾患日重的河南黄河
- 353 分流治河的实践
- 357 彪炳史册的治河名臣
- 368 治河主张
- 372 河防工作的发展
- 377 泽被民生的广济渠

381 开封城的灭顶之灾

385 第八章 清代河政的进步

387 1761 年和 1843 年洪灾

397 屡决屡堵的河南黄河

408 治河名臣齐苏勒

413 河防机构的完善

421 黄河最后一次自然改道

431 治河理论的丰富

437 堤防建设与管理技术的进步

444 敕建嘉应观

449 第九章 民国时期忧患中的河南黄河

451 近代治河思想与治河技术

461 国民政府的治河活动

467 1933 年洪灾

472 震惊中外的花园口掘堤事件

479 黄泛区堤防的修筑

486 日本侵略者对于黄河的调查研究

490 黄河回归故道

503 社会巨变中的河南黄河

515 第十章 当代治河成就

517 开辟北金堤滞洪区

523 迎战 1958 年大洪水

529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535	沁河杨庄改道工程建设
540	1982 年大洪水的启示
544	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
551	标准化堤防建设
558	王化云在黄河治理方略上的探索与实践
566	黄河治理开发技术的进步
572	水资源开发利用成绩斐然
576	古都郑州的崛起

581 结束语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600 参考文献

绪 论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的汨汨萌动到渤海之滨的淡定皈依，犹如一个生命从勃发到回归的过程。黄河经昆仑、出龙门，在经历了少年激扬和青年跌宕之后，步入坦荡的华北平原，已添了几分的从容。在这里，黄河以它中年的凝重和宽厚孕育出一片土地，谓之河南。

黄河将其生命的积累沉淀在这里，也将其苦难的承重释放在这里。于是，历史上的黄河有时显得独厚河南，有时又格外刻薄它。一边是河洛的文化璀璨，一边是洪水的恣肆漫溢；一边是几朝的古都辉煌，一边是百姓的流离失所。黄河与河南的历史渊源可谓是喜忧兼具，或者说黄河对于河南是毁誉参半。黄河乱则河南衰，黄河治则河南兴。

一、黄河是中原文明孕育成长和繁荣发展的基石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最初都是以利用河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中原文明的孕育成长和繁荣发展，更是离不开黄河，是黄河成就了历史上河南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历史上，黄河出晋陕峡谷后，穿行于中条山与崤山、熊耳山之间，进入冲积平原后，沿太行山麓折向东北，河道大致上为过去河南西北到北面的省界线。现行黄河流经河南三门峡、济源、洛阳、焦作、郑州、新乡、开封、濮阳等 8 市，河道长 711 千米，流域面积 3.62 万平方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的 21.7%。

（一）沧桑之变——黄河缔造了中原

地质勘探显示，在距今 150 万年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地壳运动，“黄河流域”形成了山脉、高原和各自独立的内陆湖水系。距今 115 万年至 10 万年间，“黄河流域”发生了强烈的地质运动，中西部高原处于上升阶段，流水下切侵蚀作用加剧，横亘于湖盆间的山地先后被切开，各个封闭的湖盆从西到东被串起来，原始黄河由此而诞生了。她冲出峡谷，奔向大海。黄河挟带黄土高原奉赠的泥沙，滚滚东行，不断填海造陆，最终造就了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为中原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肥沃土壤。

在古黄河诞生的同时，我们的祖先类人猿也第一次以“直立人”的姿态莅临东方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从此，黄河千年万载绵绵不断地流淌，人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地繁衍。从距今 100 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陕西蓝田人，到旧石器中晚期的大荔人、河套人、丁村人，黄河流域的先民们，依河而居，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和丰富着摇篮中的中华文明。

这时的中原大地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华夏先人在这里“逐水草而居”，进行着原始的采集和渔猎活动。当距今 8000 年前，随着中原先民亲手培育的第一粒种子破土而出，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率先出现了古农业。从此，人类创造活动空前繁荣，摇篮中的黄河文明得以迅速发展，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得以形成，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

（二）生命之水——黄河哺育了中原

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足的黄河水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距今 8000 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遗存中，不仅发现了粟和黍的遗存，而且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些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而距今 7000 ~ 5000 年的仰韶文化，则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距今 5000 ~ 4000 年的龙山文化大致与古文献中的尧、舜、禹时期相对应。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精美的黑陶、铜器及盛酒

器具，展示出原始艺术的灵光，表明农业生产力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分化，阶级产生，大规模的征服异族战争或部落兼并战争也因之而起。传说中的炎帝与蚩尤三次鏖战、炎帝与轩辕的阪泉之战、舜禹征三苗等，因声势浩大，惨烈悲壮，而见载史册。战争造就了部族，同时也造就了部族领袖。从炎帝、黄帝、共工、蚩尤到帝喾、颡顼、唐尧、虞舜，许许多多有名有姓的人物以其显赫的战绩而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华夏族的禹是龙山时代末期诸多英雄中的一位。在禹的领导下，中原部族取得了对自然灾害洪水和部族敌人三苗的最后胜利，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中华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奇葩

黄河哺育下的先民，不断从泱泱大河中获取灵感，演绎出文化奇迹。诞生于洛汭的“河图洛书”，被誉为中国第一文献，在中国古文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河图洛书”为起源的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黄河文化的精华。

河洛文化之所以有其特殊地位，很重要的就是它融合、吸纳了周边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也正因如此，早在先秦时期，在中原地区就形成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等学派，开创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充分印证了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

（四）漕引河湖——中原文明的基石

中原文明的繁荣昌盛是与便捷的黄河漕运分不开的。从偃师二里头到安阳殷墟，从郑州到洛阳、开封，河南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分布最多的省份。全国八大古都，有四个在河南，特别是“九朝古都”洛阳、“八朝古都”开封，更与发达的黄河漕运密不可分。

“泛舟洛川，济彼黄河。”东汉阳嘉四年（135年）刻在洛阳建春门石桥柱上的诏文中有“成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说明江淮一带的贡赋是由汴渠转输，经黄河、洛河抵达洛阳的。在隋代，随着通济渠、永济渠的开挖，洛阳也随之成为全国的漕运枢纽，并奠定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至唐代，洛阳人口过百万，四方纳贡，八方来朝，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外国商人经由广州、扬州抵达洛阳。通过丝绸之路，洛阳与欧洲、北非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唐三彩和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明由此走向中外，而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则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辉煌篇章。

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战乱和自然灾害，北方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江淮等南方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的财赋中心，汴渠也随之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大动脉。至宋代，开封一跃成为黄河中下游乃至更广大地区的漕运中枢，并从此取代了周朝以来西安与洛阳的地位，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五）功在千秋——中华治水重一河

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纵观中国历史，善治国者无不以治水为重。无论是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还是清代的康熙、乾隆等，都曾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封建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国运昌”，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黄河因其“善淤、善决、善徙”而尤为复杂、难治。“黄河宁，天下平”，“兴也黄河，败也黄河”。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兴盛与衰败，“城摞城”的独特现象，最直接地反映了黄河与封建王朝和河南的密切关系。因此，历朝历代都将黄河的治理视为安邦定国的大事。

西汉元光三年（前 132 年），黄河在今濮阳境内决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亲赴堵口工地视察，命令随行将军、大臣负草堵口，一举成功。清康熙帝则将事关黄河的“河务、漕运”与涉及国家命运的“削藩”并列为三件大事，书写于宫中柱上，以时时提醒自己对黄河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因治理黄河而涌现出的先贤仁人更是层出不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绝大多数都与黄河的治理开发有关，如西汉贾让、东汉王景、元人贾鲁、明人潘季驯、清人靳辅和陈潢，等等。

二、黄河保护治理是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起步，至今已走过 70 余年光辉历程。70 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怀河南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一直把河南黄河作为下游防洪治理的重中之重；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都把黄河的事情作为影响全局的一项重大事情来抓。70 多年来，经过河南省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河南黄河保护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岁岁安澜，为河南省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

进入新时代，河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正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时代篇章。

（一）防洪——托起一片宁静的蓝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总结 1949 年严重秋汛的基础上，正确地实施了“宽河固堤”方略，取得了迎战 1958 年花园口 22300 立方米每秒特大洪水的重大胜利。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为标志的“蓄水拦沙”方略在实施中尽管遭受挫折，但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泥沙问题、防洪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也正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才有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拦、排、放、调、挖’等综合治理措施，处理和利用泥沙”科学治河方略的诞生。

依靠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全省党政军民众众志成城，顽强拼搏，严密防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抗洪抢险的胜利。先后战胜 10000 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 12 次，特别是战胜 1949 年 12300 立方米每秒、1958 年 22300 立方米每秒、1982 年 15300 立方米每秒等特大洪水和 2003 年、2021 年秋汛洪水，赢得了 70 多年岁岁安澜，彻底改变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险恶局面，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达数千亿元。

（二）堤防——抗御洪水的铜墙铁壁

堤防是人类与河流抗争、同洪水相搏的产物，并贯穿于整个黄河治理的历史。然而，堤防建设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却是从人民治理黄河以来开始的。

1946 年，围绕黄河归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河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复堤整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 4 次大复堤，昔日满目疮痍的黄河大堤，而今成为坚固的水上长城。

1957 年第一次黄河大复堤任务完成，初步实现了“宽河固堤”的治理目标。1963—1967 年组织实施了第二次大复堤。1985 年第三次大复堤完成。至此，河南黄河堤防高度全部达到了防御花园口 22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洪水的标准。1998 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大水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黄河治理的投资力度，第四次堤防加固工程也随之展开。

进入 21 世纪，在实现中原崛起进程中，黄河治理开发翻开了最辉煌的一页。为确保“堤防不决口”，确保黄河下游广大地区免受洪水之灾，国家将建设一个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高标准堤防体系提上议事日程。至 2022 年，黄河河南段标准化堤防全线竣工。标准化堤防建设，不仅大大提高了防御洪水的能力，而且在黄河下游形成了宽 100 多米、长达数百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成为防止风沙、调节气候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水库——峡谷平湖谱新篇

建坝筑库，是利用现代水利技术开发河流、防洪减灾的重要工程措施。人民治黄以来，先后在河南黄河干流上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西霞院等水利枢纽工程，在支流洛河、伊河、沁河上修建了故县、陆浑和河口村水库。它们如同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并与下游堤防、分滞洪区一起组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为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成长起来的三门峡市，已成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作为黄河干流上最后一座大型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揭开了黄河治理的新篇章。

通过三门峡、小浪底单库运用或多库联调，成功拦蓄黄河洪水，先后削减 10000 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洪水 6 次，为河南黄河的岁岁安澜奠定了良好基础。2003 年 8 月，小浪底、三门峡、陆浑、故县 4 库联合拦蓄黄河秋汛洪水，将 6000 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峰削减到 2700 立方米每秒，使河南黄河滩区 70 多万人、200 多万亩耕地免遭洪水侵袭。另外，小浪底、三门峡水库的联合运用，基本解除了黄河下游的凌汛威胁。

利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水量调节，不仅大大提高了控制洪水的能力，同时也使黄河从防御洪水迈向了有效管理洪水、利用洪水的新阶段。2000—2023 年，小浪底水库共向下游供水 6473 亿立方米，在确保黄河连续 24 年不断流的同时，保证了洛阳、郑州、新乡、开封、濮阳等城市供水和沿黄农田灌溉；从 2002 年开始，连续 22 年调水调沙，成功地将 33 亿吨泥沙送入大海，河南河段主河槽最小过洪能力也从 1800 立方米每秒提高到 5000 立方米每秒。而黄河不断流，河道湿地得到修复，所发挥出的巨大生态效益更是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河南黄河水库群总装机容量 247 万千瓦，其中小浪底水电站是中原地区最大的水电站，6 台 3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年设计发电量 51 亿千瓦时。这在以火电占绝对比重的河南电网中发挥了巨大的调峰作用，为河南工业、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电力资源。

名山雄峙，碧波荡漾，高山、大坝与碧波清泓相辉映，工程建设还带动了河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沿黄高速公路、公路、生态廊道和座座跨河大桥的建成，将三门峡、小浪底等一系列水利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串联起来。在领略九曲黄河神韵、高峡出平湖绮丽风景的同时，使游客深深感受到了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供水——周润万物淌甘露

黄河是河南最大的过境水资源，占全省入境水资源量的近 90%。河南引黄灌区是中国夏粮主产区，在中国粮食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南素有“中原粮仓”之称，中原熟，天下足。河南用不足全国十六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近 1/10 的粮食、四分之一的小麦。自 2017 年开始，河南粮食总产量已连续七年稳定在 1300 亿斤（1 斤 = 500 克 = 0.5 千克）以上，不仅解决了河南 1 亿人的吃饭问题，还每年调出原粮及制成品 600 亿斤。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河南粮食总产量 1324.9 亿斤，居全国第二，秋粮产量增速居粮食主产省第一，创历史新高。

汨汨流淌的黄河水，不仅滋润着万顷良田，也成为沿黄地区城市、工业和生态用水的重要来源。多年来，河南引黄供水量基本稳定在 30 亿立方米以上，在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支撑能力明显增强，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高，逐步构建起了河南引黄供水事业发展的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聚力中原，对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不懈努力，“母亲

河”必将为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的实现，给予更深厚的馈赠。

此外，为缓解天津市的严重缺水状况，1972—2012年，通过人民胜利渠等，先后12次向天津紧急调黄河水78.8亿立方米。其中，通过人民胜利渠调水4次，调水量达9.32亿立方米。为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自2017年11月至2023年5月累计调水27.73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沿线农业灌溉需求，有效纾解了华北地下水超采危机，改善了白洋淀生态环境，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水资源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河南黄河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积极探索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不断谱写“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壮丽长歌。

第一章

先秦时期黄河对中原的馈赠



先秦时期的黄河，在今荥阳、武陟以下有3条，即山经故道^①、禹河故道和西汉故道。其中，“禹河”能够稳定流过1400年左右，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黄河当时尚处于自然状态。“逐水草而居”，水退人进，水来人退，人为破坏少、干预少，中上游植被多处于原始状态，黄河泥沙量尚未那么严重，洪水宣泄较为畅通。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人与河是和谐相处的。

受益于黄河的馈赠，中原文明开始不断走向历史的辉煌。距今5800年前后，以灵宝西坡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仰韶中期文化——庙底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被很多学者称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距今5300年前后，以巩义双槐树遗址群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已基本可以认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很可能已出现王权和古国形态意义上的国家。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寨等集中分布的中原城址群。距今3800年前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郑州、安阳、洛阳、开封相继崛起，成为先秦时期中国古都文明的耀眼之星。

先秦时期，关于黄河的信息支离破碎，但从中不难看出时人为防御洪水灾害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越发彰显了母亲河的重要地位，以及兴修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

^① 见于《山海经·山经》的先秦黄河下游河道。

禹河故道^①

据文献资料，在西汉故道形成前，今荥阳、武陟以下有山经故道和禹河故道。

中国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禹河与“山经河”在河北深县（今深州市）以上故道线路相同。另有学者则通过对卫星影像判别和实地考察，进一步指出了“山经河”在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的具体走向为：武陟东石寺—获嘉照镜—新乡市区北部—卫辉，与郛封岗遗迹同，在禹河故道之西，且先于禹河故道。

至于禹河故道在该区域的走向也有多种说法。《禹贡》记述的河道为，孟津及洛水入河处，然后经大伾山。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认为，古济水是东周河徙前的黄河故道，自荥泽，经阳武，至封丘、长垣。当代有关学者认为是“自武陟北郭经圪垯店南、新乡七里营北和朗公庙、卫辉东……”^②在上述说法中，后一种观点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地质考证的结果比较吻合。

“逐水草而居”，是先民生存的最大特点。分布在武陟境内的多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为“山经河”、禹河故道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草亭遗址、东石寺遗址、商村遗址、邸郃遗址等，都应位于远古时期的黄河岸边。据清乾隆二十一年《武陟县志》载：“县东邸郃镇及商村北，旧堤尚存，称汤王堤。”在今武陟县东中心线上，有一条古村落带：木栾店、马曲、大

① 黄河第一次大改道之前的河道称为禹河故道，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老的一条黄河河道。

② 安芷生：《黄土 黄河 黄河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第106页。

等，是为黄河下游向南、向东滚动改道的地质背景。

与西方“诺亚方舟”逃离洪水的神话传说相反，在中国的传说中，先民选择与洪水抗争。尧、舜都曾选派治水能手抵御洪水。禹的父亲鲧曾奉尧的命令在大伾山之北、太行山之南（今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恩村）设立指挥部，奋力治水，可惜成效不大，被舜流放，后虞舜念其无功亦苦，便赐名此地为鲧镇（今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恩村）。

鲧之后，他的儿子禹登上了历史舞台。《史记·夏本纪》载，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认真吸取共工与其父鲧的经验教训，“疏川导滞”，成功地治理了水患。

大禹治水，实质上是较大规模疏通水道，实现了自然水道与人工水道的融合，进而解决了平原地区水系的漫流，形成较好的平面水系。《史记·河渠书》载：“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入于渤海。”东汉末年轻学家郑玄考证，大伾山在宁邑（今修武、获嘉、武陟、荥阳一带）及其周边。据《水经注》引郑玄对“大伾”的注解：“地喉也，沅出伾际矣，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沅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位处黄河右岸的大伾山大体呈东北走向，左岸还有东西走向的清风岭，都是黄土山。也有人认为，大伾山东北走向一直绵延到鹤壁市浚县。《汉书·沟洫志》解释“北载之高地”说：“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黎阳，即今鹤壁市浚县。“遮害亭”在浚县西南、淇口之东9000米，为古黄河所经。

至于大禹治水为何选择从大伾山疏通北流渤海河道，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学者根据渤海和黄海海岸贝壳堤考古发现猜测，远古黄河本来就有北流渤海河道、南流黄海河道，大体以大伾山为顶点，以百年或千年为周期摆动。二是南流黄海河道可能不止一条。2011年南水北调中线干渠郑州段开挖出露的地层表明，距今1万到3万年前晚更新世时期，黄河曾经从现在地势比较

高的荥阳黄土阶地流过郑州西郊、南郊，起码算是古黄河的汉道或者泛道。大伾山是黄河冲积扇顶部在黄水泛流里的中流砥柱。相对地，就有大伾山东侧汉道或者泛道。3 万年以来郑州西部整体的抬升数值为 20 ~ 40 米，进而导致这些汉道在距今约 1 万年时已绝流，嵩山及今天的广武山来水除有少部分流入黄河外，绝大部分流入古济水。三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南流黄海河道随着地势的进一步抬高，已难以顺畅行洪，只好选择疏通相对较低的北流渤海河道。禹选择在大伾山之狭窄处“地喉”，可能是天然的沟道，或者就是远古的河道，向东北方向挖通清风岭与大伾山之间水渠（今有郇封岭黄河故道遗迹），大概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终于开挖出两条引水渠，使黄河北流降水（今漳河），再入大海。同时，禹在大伾山开阴沟，分黄河水入济水，形成了黄河右岸的引黄分洪渠道^①。

自大禹治水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在现存的史籍里很少见到关于洪水的记载，但在个别史料中间或也有所透露。如“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就是一例。冥，是商部落的君主，是夏时水官，在治河时溺死，以身殉职。可以推想作为水官亲临治水第一线而溺死，看来水患也非一般。

夏代气候比较干旱，末年出现了严重旱灾，伊洛河一带夏人统治区实



图 1-2 网格纹铜鼎 夏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藏

^① 徐海亮：《郑州段南水北调引水渠揭示的史前黄泛奥秘及湖泊文化》，《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1 年第 19 期。

力大损，居于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可能受灾相对比较轻，故而趁机起事，夺取了夏朝的统治权。《国语·周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商的居地，主要在黄河下游，以今之河南、山东和河北南部为中心。相传商的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史记·殷本纪》）。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炎”（灾的繁体字）和“昔”等字样，甲骨文为横着的“𠂔”或“≈”。前者好似河道中壅，致使河水漫溢，后者颇像洪水泛滥。“昔”甲骨文从横水从日，像是洪水滔天的景象。有人解释为人们对于往日洪水印象深刻反复回忆，引申为过去的时光。商代帝都迁徙频繁，汤建立商朝前就曾几次迁居，汤至盘庚后又数次迁都，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是与黄河水患不无关系。“祖乙圯于耿”（梅賾本：《尚书·咸有一德》），有人解释说就是祖乙的都城耿（在温县东）曾被河水所毁。此外，从商代占卜中也可窥探出当时是有过洪水的。是否发水，要请教上帝，而且当时曾用“沉五牛”“沉妾”来祭祀，祈求保佑。如果没有大洪水的侵扰，是用不着这么隆重的。

西周关于河事的记载也很少。周太王居岐（今陕西岐山县），周武王居镐（今陕西长安县），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的渭水流域，下游的事很少记载，而对于直接影响都城一带的河流变化，大都有文字记载。例如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发生地震，黄河的三条支流泾、洛、渭，因岐山震崩，川源阻塞而干涸，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因此，《国语·周语上》将“三川竭，岐山崩”作为一件国家存亡大事记载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河事的记载逐渐增多起来。关于自然决口事件，仅古本《竹书纪年》就载有：晋襄公六年（前622年），“洛绝于洹”；晋定公十八年（前494年）“淇绝于旧卫”，二十年“洛绝于周”；晋出公五年（前470年）“浍绝于梁”“丹水三日绝，不流”，二十二年“河绝于扈”；晋幽公九年（前429年）“丹水出，相反击”；魏哀王九年（前310年）“洛入成周”，十年十月“河水溢酸枣郛”。此外，由于各诸侯国互相攻伐，以

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事件也不断出现，如魏惠王十二年（前 359 年），楚国出师伐魏，决黄河水灌长垣；赵肃侯十八年（前 332 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决河水灌敌；赵惠文王十八年（前 281 年），赵国又派军队至卫国东阳，决河以淹魏军；秦王政二十二年（前 225 年），秦将王贲率军攻打魏国，引河沟水灌大梁（今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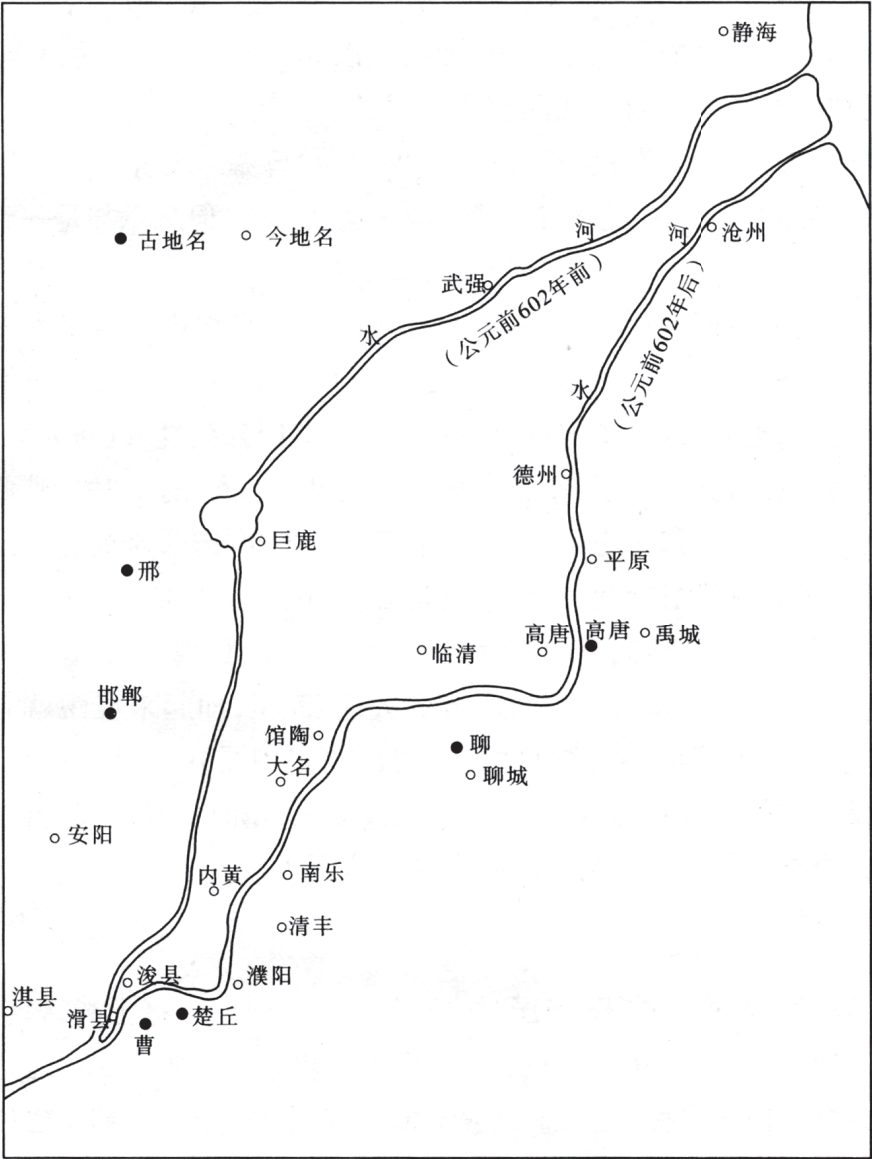


图 1-3 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黄河改道经行地区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河决，除上述几次外，最重要的一次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的黄河大改道。据《汉书·沟洫志》载：“大司空掾王横言……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这是记载周定王五年河徙的最早资料，古人多以此次河徙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但从什么地方改道，流经什么地方，古史中没有记载。宋代以后始有“周时河徙玲砾”之说，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认为《水经注》中所说的“大河故渚”王莽河就是周定王五年改道后的河道，一般多从此说。经后人考证，这条河道大致经过现在的滑县、浚县、濮阳、内黄、清丰、南乐、大名、馆陶、临清、高唐、德州、沧州等地东入渤海。

河图洛书与河洛

“河图洛书”是与上古帝王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字眼，遍载于经史典籍。伏羲、黄帝、仓颉、唐尧、虞舜、大禹等传说中的显赫人物都与此有关。而进一步分析“河图洛书”产生的缘由，则主要发生在他们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是天降“神物”，具有传授“天命”的重要功能。另外，有学者又把“河图洛书”定位为中华文化的最早萌芽和第一个里程碑，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

“河洛”即黄河、洛河相间的地方。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上古帝王活动的主要区域。特别是洛河与黄河交汇处——洛汭，曾长期是他们祭天典礼，祈盼天降祥瑞、河清海晏的朝圣之地。因此，“河图洛书”的产生和发展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河出图，洛出书”，指的是黄河出“河图”，洛河出“洛书”。然而，按史籍记载最早诞生“河图”的河流既不是黄河，也不是洛河，而是孟津县境的孟河（亦说图河），被誉为“河图之源”。

据《汉书·孔安国传》记载，“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一记述首次把“河图洛书”与上古帝王活动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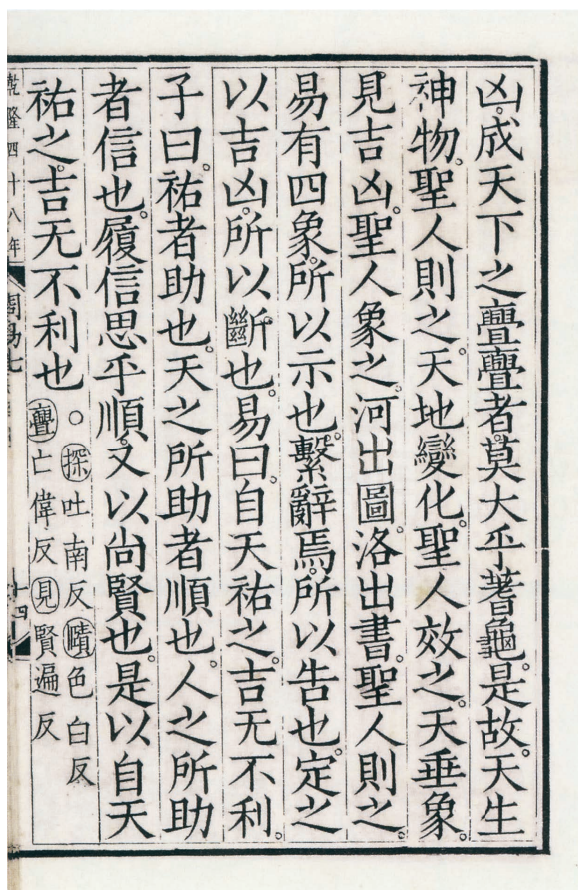
龙马负图寺位于今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雷河村，因龙马“负图出于孟河之中”而兴建。始建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初名“浮图寺”，永嘉时改为“河图寺”，梁武帝改称“龙马寺”，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更名为“兴国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仍叫“负图寺”，清乾隆十九

年（1754 年）又改为“羲皇庙”，民国后又称其为“负图寺”。该寺北临黄河，南依邙山，寺前紧邻孟河故道，规模宏伟，宫殿巍峨，山门峻拔，前有崇邱横卧，后有大河奔涌。山门东西分立“图河故道”“龙马负图处”两通巨碑。寺内存有宋、明、清历代著名理学家、书法家及诗人邵雍、程颐、朱熹、王铎、张汉等撰述的碑、铭、诗、赋。

洛河，古称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木岔沟，经陕西省洛南县和河南省卢氏、洛宁、宜阳、洛阳、偃师等县（市），于巩义市注入黄河。“洛出书”的“洛”指的就是洛河。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注“洛水”云：“昔黄帝之时，天下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据传，得书的地点在洛阳汉魏故城南，旧伊洛河汇流处。

《河图玉版》说：“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玄扈洛汭”，即今洛宁县玄扈河与洛河交汇处。明代《河南通志·古迹》中记载：“龟剿：在永宁县西洛水北岸水滨，乃夏禹治水龟呈汭处。”“龟剿”即



如今洛宁人所说的龟窝，在洛河支流玄沪河上。在该县西长水村现存的两通古碑中，东边一碑为沙质岩石，上圆下方，额刻圭首，由于年代久远，只剩一苍劲有力的魏体“洛”字，据专家学者考证为汉魏遗碑。西边一碑石灰岩质，为清雍正二年（1724年）腊月永宁县令沈育所立，碑上4个大字为“洛出书处”为河南尹张汉所书。

《竹书统笈》载：“洪水既平，（尧）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滌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廻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有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土为口，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文曰：闾色授帝舜言虞夏当受天命。帝乃写真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沉璧于洛，视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此处所说的“首山”，即洛阳附近的首阳山。

“河出图，洛出书”，在史籍记载中更多发生于“洛汭”，即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

《水经注》说：“洛水又东北流入于河，《山海经》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谓之洛汭。’”并注引《史记音义》说：“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沈璧，受龙图于河，鱼书于洛，赤文绿字。”

此后，舜、禹也在洛汭得到了“河图洛书”。《竹书纪年》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在舜设坛沉璧祭天，河图传达天命之后，禹才执掌天下。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

另外，还有多部典籍记述了“河出图，洛出书”。如《后汉书》方术列

传，李贤注引《尚书中侯》说：“尧沈璧于洛，玄龟负书，背中赤文朱字，止坛。舜礼坛于河畔，沈璧礼毕……舒图出水坛畔。”《玉海》引《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故图有九篇，书有六篇。”《绎史》注引《河图挺辅佐》云：“黄帝修德立义，天下乃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天其授帝图乎？”等等。

到了夏、商、周三代，洛汭这一上古帝王祭祀之地仍不断诞生“河图洛书”。

面对夏桀的荒淫无道，汤部兴起，为祈求天意，取而代之，商汤便到洛汭祭祀。据《竹书纪年》记载：“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沉璧退立，黄鱼双踊，黑鸟随之，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汤当代之。”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少，由周公旦摄政7年。《水经注》中说：“与成王观于河洛，沉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昃，滌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啣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元龟青龙，苍光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授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销，龟随甲而去。”

从上面有关记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出图，洛出书”这一记载不断衍生、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产生了由“图”到“书”再到“图”“书”并存的发展过程。

伏羲是与“河图洛书”产生关联最早的上古帝王。“负图出于孟河之中”，才有了伏羲八卦图。这里，只讲到了“河图”，而发生地则在洛阳孟津境内的孟河。

此后，在洛河上又多次诞生了“洛书”。仓颉在洛宁县玄沪河与洛河交汇处求得“灵龟负书”，黄帝、尧相继又在洛河上获得“洛书”，且地点由伊河、洛河交汇处移至首阳山。

“河出图，洛出书”的重要发生地在洛汭。黄帝、舜、禹及商汤、周成

王等都在此得到了“河图洛书”。

地点变了，形式也在变。伏羲“龙马负图”、黄帝“洛书鱼献”、仓颉“灵龟负书”似乎为偶然事件，而舜、禹的继位则是沉璧祭天的结果。

更为有趣的是“河图洛书”的内容变化。

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他造书契、正婚姻、教渔猎，结束了人们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蒙昧历史，开创了中华文明，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根之祖”“人文之祖”。因“圣人在位”而发生了“龙马负图”，他还因此而发明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内容的“八卦图”。

黄帝是统一中原华夏地区的功臣。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繁多，成就辉煌，因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洛书鱼献”，说的是黄帝通过“洛书”得到了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创造了不朽的功绩。

仓颉得“灵龟负书”尽管未明确具体内容，但后人却把仓颉创造文字与“河图洛书”紧密联系起来。如《春秋元命苞》说：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意思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在“灵龟负书”的启发下完成的。

尧在洛河的两次祭祀活动，一是为了庆祝洪水制伏，水灾消除，告天知道，而引来了龙马负图；二是为找接班人，于是修坛沉璧，获得“洛书”，在得到上天的旨意后，把王位交给舜，乃有禅让制的产生。

到了禹，“河图洛书”除反映君权天授外，还提到河图言治水之事，洛书（龟书）则是“洪范”，而“洪范”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也有认为“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

史前历史是口耳相传的历史，对重大事件代代相传并被后人记录下来，应有其相对真实的一面。“河图洛书”是与上古帝王紧密相关的重要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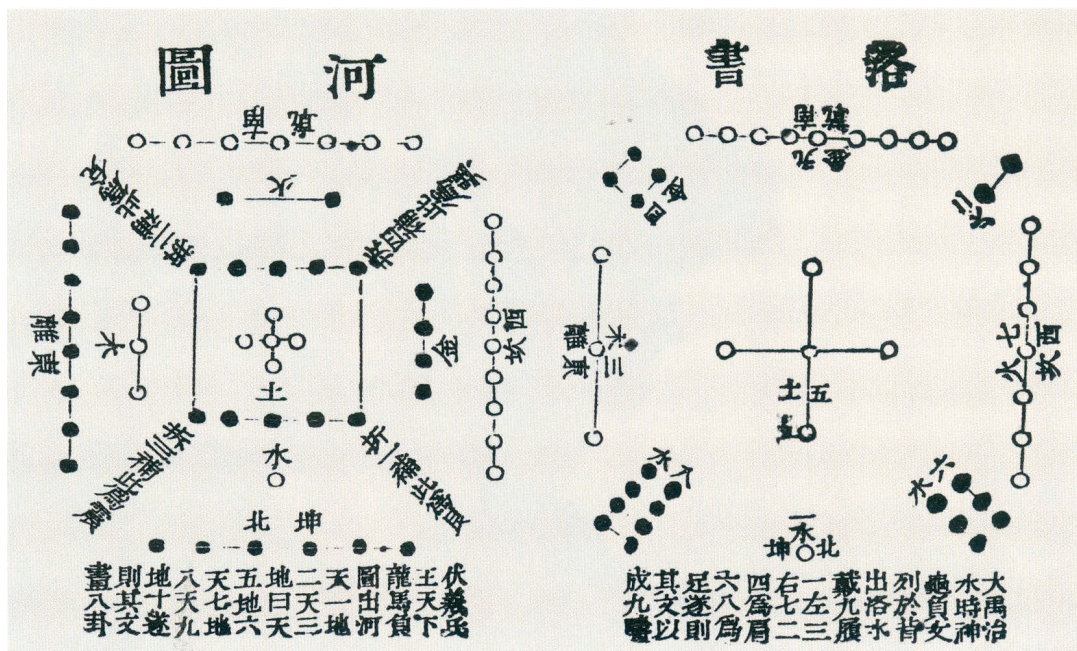


图 1-5 《三才一贯图》之河图洛书 清 吕抚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三才一贯图》绘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内容可分为“天”“地”“人”三部分，展现了时人的天文、地理、儒学、历史、神话认知

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才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相传下来。若把“河图洛书”出现地点的变化归结为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形式上的改变则应是古人认识进步使然。由孟河（图河），到洛河，再到洛汭，开始可能为偶然现象，而后就成了上古帝王们追求的目标。

至于内容的变化，则突出地体现了“河图洛书”在上古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伏羲“龙马负图”、黄帝“洛书鱼献”、仓颉“灵龟负书”是天降祥瑞，因而也就有了“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周易·系辞下》）。到了尧、舜、禹时期，“河图洛书”更是成了“天命”的代表。因此，后人对“河图洛书”有着极高的评价。依《周易》说，他是天降“神物”，是“圣人”的法则；依《尚书》所记，他是周康王即位大典上陈列的天书；依《礼记》载，他与“膏露”“醴泉”“器车”并列，共为“天地山

河”孕育生灵、陶冶人文之精华；依《论语》孔子之慨叹，他又是治国平天下之先机，太平盛世之本源，等等。洛汭，亦因此而长期成为帝王们的朝圣之地。

最晚在西汉时期，“河洛”这个地理概念就已经出现，如《史记·封禅书》中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关于“河洛”的区域定位当今有3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瀍、涧诸河）。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黄河中游、洛水流域这一广阔的地域范围。具体地说，即黄河从河曲（风陵渡）向东经三门砥柱，过孟津直达荥阳、郑州，这一段大河以南，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古时称为河南地，亦称之为河洛地。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

首先，“河洛”之所以能够成为“河图洛书”的诞生地，与上古帝王在这里的长期活动密切相关。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伏羲氏、神农氏、有蟠氏、少典氏、炎帝、黄帝、帝喾等这些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上古帝王，都曾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盆地留下遗迹。伏羲氏主要活动于今浞池、新安、孟津、巩义至上街一带，并在此发明了八卦、网罗与动物饲养。神农氏出于湖北厉山，其后继者迁居河洛，孟津之潜亭山即神农赫苏氏之都。有蟠氏生活于平逢山即洛阳北邙山一带。少典氏世代居住在青要山及其周边地区。炎帝、黄帝俱诞生于河洛，并都曾活动于洛阳。炎帝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顶峰，黄帝推进原始畜牧业发展，并建密都于青要之山；帝喾受封之高辛在今伊川，即帝位后都偃师。而到了尧、舜、禹时期，更是把洛汭作为修坛沉璧、祭祀上天的圣地。夏、商、周三代也长期定都于河洛地区。^①

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河汇入黄河处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更以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

^① 杨作龙：《河洛上古历史文化考论》，《洛阳师范学院报》2006年第1期。

表性和影响力。同时，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这一时期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其次，河洛成为“河图洛书”的诞生地，也是各类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的结果。考古学家严文明将史前文化划分为中原、甘青、燕辽、山东、江浙和长江中游6大文化区，并强调其他5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5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河洛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正是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类文化交汇融合的焦点。如黄帝部落往来无常处，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这就使得周边的文化在中原得到交汇和融合。颛顼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尧以亲“九族”而闻。“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这种“合和万国”就是各种文化间的交融与综合。大禹治水时，“道九山”“道九川”，最后实现天下太平，“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史记·夏本纪》）。可以看出，夏禹治水后达到了天下文化的融合。交流促发展，“河图洛书”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丰富，应该说，就是黄河文化萌芽的最有力的证明。

治水传说

在距今 1 万年至 3000 年的早中期全新世时期，是古黄河水系的大发展时期。河水上下贯通，沟系发育迅猛，尤其是黄土高原，出现了千沟万壑的场面。随着土壤侵蚀加剧，河水泥沙剧增。在此期间，古渤海曾两次西侵。由于洪水泥沙增加和海平面的升高，河水排泄受阻。面对洪水的侵扰，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极其艰苦地与洪水作斗争，留下不少洪水肆虐以及英雄治水的传说，成为远古人民征服洪水的象征。

传说中最早治水的是共工。共工既是人名，又是氏族部落名，相传是炎帝的后裔，共工部族的活动区域位于今辉县一带，这里南临黄河，北依太行，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适宜农耕。由于该地位于黄河拐弯处，除黄河外，附近还有共水、淇水等，一到洪水季节，黄河及其支流经常泛滥，为害不浅。《管子·揆度》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为了部族的生存与生活，共工亲率族众治水。《国语·周语》言及共工氏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即将高处的泥土、石块搬至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筑一些土石堤埂，保护居住区和耕地，以抵御洪水的侵犯。共工治水颇有成效，深受百姓爱戴，《虞书·尧典》载：“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在与洪水的长期斗争中，共工部族积累了不少经验。《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表示该部族与水的密切关系。《国语·鲁语》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为社。”共工之子后土成为古代重要祭祀“社稷”二神之一，后被升为配祀中央黄帝之神。其后代子孙四岳，辅佐大禹治水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充分说明百姓对共工部族治水成绩的高度肯

定，因此“共工”一词曾为水官称谓，专管水利之事，并沿用了一段时期。

尧舜时期，洪水之灾依旧。传说中，这一时期出现的治水者是鲧和他的儿子禹。

鲧居于崇，今河南嵩山一带。《史记·夏本纪》载：“尧听四岳，用鲧治水。”由于鲧部族知悉水性，加之四岳举荐，尧帝遂派鲧去治理洪水。鲧的治水方法还是沿用共工的老办法，即用“堵”和“堙”的方式去“障洪水”。《淮南子·原道训》载“鲧作三仞之城”，即用堤埂把居住区和田地保护起来，用息壤挡住洪水漫延，而不疏导河道，水无归宿，最终无法阻挡来势凶猛的大洪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水害不息”，虽经过多年的治理，水患依然没有解决，治水效果并不理想，鲧也因此被舜殛于羽山。

鲧死之后，他的儿子禹接受了舜帝的任命，与伯益、后稷一起继续领导治水工作。《史记·夏本纪》载，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吸取其父的治水经验教训，探求治水方式方法。他注重勘察山川地貌，命令诸侯百官发动那些被罚服劳役的罪人分治九州土地。他一路穿山越岭，竖立木桩作为标志，测定高山大川的状貌。“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同时他善于以水为师，根据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浚排洪。《尚书·益稷》载“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国语·周语下》又载“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就是利用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顺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禹的这种由“障”到“疏”的方法，使洪水归槽，增加了河道的泄洪能力，并起着蓄水分洪作用，减轻了洪水的威胁。同时，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禹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找到有治水经验的伯益、后稷、四岳等部落首领做帮手。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韩非子·五蠹》称禹“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就是说他在治水过程中不仅亲自参加劳动，不畏艰苦，连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了。而且他还公而忘私、治水勤勉。《史记·夏本纪》称禹

“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论语·泰伯》则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此外，大禹治水时发明了原始的测量，即所谓“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准绳”“规矩”就是类似今天的角尺、圆规等简单测量工具，“行山表木”“随山刊木”大概是刻度尺之类的水准测量工具，用以测定地势高低、位置和方向，作为施工的依据。又据《周髀算经》载“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数”也是大禹在治水中发明的。

经过多年努力，大禹治水终获成功。《孟子·滕文公下》载“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新语·道基》中言“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方法得当并取得胜利的大规模治水活动。他采用“因水之流、疏川导滞、分流入海”的治河方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几千年来一直指导和激励着治水事业。据《左传·昭公元年》，春秋时人刘定公曾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荀子·成相》中也称颂道：“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大禹作为治水英雄，其改“障水”为“疏导”的方式为后人治水提供了借鉴，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为人们所赞颂，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内核之一。

由于大禹治水成功，人群聚居地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尚书·禹贡》记载：“九河既道……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意思是洪水消退之后，原来积水的地方土壤肥沃，草木茂盛，避居高地的人们迁往平原，筑宅垦土，以事农桑。这意味着，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广阔平原上，更为先进的农耕生活开始了。同时，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各个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协作得到加强，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区划分的“九州”所代替，促成了国家的诞生。由于治水活动，各族部落被大禹的声望所折服，拥护其为全国共主。大禹去世后，禹的儿子启夺位称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自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